

# 貧窮問題的

## 研究

江若珉

### 壹、導言——貧窮的存在與本質

姑不論貧窮的定義，「貧窮」存在於世界上的每一個社會。因為無論在何地方，「凡人獲得或控制需要之物比另一人爲多，即有富者與貧者之分。」（朱岑樓，一九七二：三〇八）赤貧如新幾內亞的土人社會固然充滿了貧窮的人，號稱世界最富有的亞美利加，貧窮的人亦處處可見（Martin Rein, 1969(4): 154。都市的貧民窟、鄉村的低生活水準以及日益嚴重的失業人口，都是貧窮存在的具體指標。

從歷史上看，在交換制度和價值等級出現之前，貧富並存，並未形成社會問題。直到貿易擴張，財富大量集中，社會中各份子的經濟地位有顯著的差異，且差異的比較和評價的標準也建立起來的時候，貧窮才成爲問題，並且含有重大的意義（朱岑樓，一九七二：三〇八）。因此，貧窮可以說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副產品，技術的改進固然促使社會向前推進，可是並不是所有的人均蒙其恩賜，事實上，新技術的使用，淘汰了那些停留在老技術中的謀生者，使他們失去了競爭的能力，直接造成了貧窮（Michael Harrington, 1969 (17)；原本「缺乏」是稀鬆平常的事，經過經濟情況的改善，「擁有」爲常態，「缺乏」（或未達到水準）就成了「貧窮問題」。

貧窮的問題以窮人的數量分布看，美國的資料顯示：大都會地區是八分之一的比例，都市外圍地區是十五分之一，鄉村地區是四分之一（Martin Rein, 1969(4): 152-153），在都市及其外圍地區，區位分布的特性，使得貧窮集中，並且在使都市貧窮的社會情況未改善前，這種集中的趨勢仍會持續下去，如滾雪球般愈滾愈大；而鄉村地區——四分之一幾近於普遍現象，但由於地方大，分布散，一時之間不易覺察其嚴重性，其實，在目前的工商爲主的社會體系下，鄉村農民多半已成被犧牲的一羣——爲了換取工商社會的整體發展和進步，而鄉村中絕大多數以農爲主的人，在被犧牲的大前提下，離貧窮的階段就不遠了；在臺灣，農業不僅是一種「生計」，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方式」，鄉村人民的生活反倒是最能調適於嚴重經濟萎縮的一羣，在工商經濟出現危機時，鄉村人民不但能維持其生活，同時還負責吸收一些從都市淘汰出來的人，減

輕一些都市的嚴重失業問題。由此，貧窮縱然是普遍，却有因時、因地、因文化之不同，對貧窮問題的探討，必須考慮較廣的層面。

貧窮現象之存在，固是與人類社會並存，但貧窮「問題」之出現則是較晚之事，社會對貧窮問題普遍的關注更是晚近。一九六二年 Michael Harrington 所寫的「另一個美國」(The Other America)一書問世，指出富裕如美國者仍有貧窮問題之存在，引起了廣泛的社會輿論，也促使社會學者注意到這個由來深遠的社會問題。今日，社會學者重視貧窮的探究，一方面固然是客觀事實的呈現，另一方面也是基於倫理的人道立場，認為社會上各階層的人都應該有同樣獲得身心發展的機會(鄭美能，一九七四：一)。由於主觀地以不同態度面對貧窮，貧窮所引起的社會回響也就更加複雜了。

## 貳、貧窮的界定

為貧窮下一個文字定義並不難，但要決定一個操作性的標準，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貧窮係指「人類基本需求之匱乏」、「缺乏獲致最小需求之收入」，但這「最小需求」或「基本需求」如何決定，基本上就要靠社會、文化、生活方式、時空等複雜因素的考慮了。

一般說來，談到貧窮，可由四個層面來討論：

(1) 收入標準——由個人或家庭的收入，界定劃分貧窮的水準，這也是一般討論貧窮問題時大多數人都會提到的。基本上，貧窮是指生活水平在「起碼的」水準之下的情況，這起碼的水準，由於社會情況之不同，就會有很大的差異。今日先進國家的國民平均所得已達美金六千九百八十元，而低所得國家只有一百七十美元(註一)；在美國被列入貧戶的收入水準，在印度可能是富翁；各國的社會情況不同，對「基本需求」之滿足不同，遂需要有不同的劃分標準。此外，各國逐年的標準也不盡相同，十年前與十年後的等量收入可能差以千里；社會變遷會使絕對標準之「貧窮線」失去時效！家庭收入與家庭成員人數，扶養比例等都應列入劃分標準的項目之中。因此，貧窮線的劃定，顯然應有「相對」的特性，單靠收入的絕對數字，是難絕看出真象的，即使在同一文化脈絡下，也應有因時、因地的考慮。

註一：據一九七七年資料顯示：低所得國家的平均國民所得為一七〇美元，成長率為一·四；中所得國家為一一四〇美元，成長率為三·六；工業國家為六九八〇美元，成長率為三·四；而我國同期為一一七〇美元，成長率為六·二。(見「臺灣經濟」No.41, 1980)

(2) 社區資源分布的情形——由一個地區資源分布的結構，可以看出一些貧窮的端倪。如從一個社區人。從事職業的分布情形，可以預測一些社區的貧窮現象：如果社區中從農的人口比率甚高，其貧窮的問題大概是會普遍存在，但其發生情況，多數人口從事勞工業者又有很大之不同。社區取得資源的途徑如果較多，可能促使社區居民改善生活的機會和動機較多、較強，貧窮問題即可獲得改善，同時社區資源豐富，可以造成增加收入之機會，社區居民改善貧窮的直接途徑相對增加！

(3) 勞動力及勞動力參與率——社區的人口結構中，勞動力原本就小的地方，造成貧窮的可能性愈大，這是根本的人力資源缺乏；由於社區物質資源的缺乏，或傳統生活方式的限面，亦會造成勞動參與率的低落，形成貧窮的間接原因。然而，人為的不當因素——如不適當的輔導，不合理的制度，更足以造成勞動力與勞動參與率的降低，這才是比較嚴重而可以討論的重點。

(4) 生活方式、觀念和態度——社會的生活方式足以影響貧窮的觀念和態度。都市裏的貧窮與生活方式、生產技術、失業等問題密切相關；鄉村裏的貧窮却和農作物的價格、銷售、天災地變等情況有關。貧窮現象不是突然發生，也不是孤立的事件，受限的生活方式，不良的教育，不健全的身心發展，加上資源的缺乏，足以造成貧窮的惡性循環，要想有效地改善，除非是徹底地改變某些社會制度，甚至是「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 見 Michael Harrington, 1969 (I) xiii)。將貧窮的問題納入一個文化的體系之下，依筆者個人的意見，比較能看出貧窮問題的癥結所在。此一部份的詳情，將留待下節說明。

此外，有人以營養的觀點來界定貧窮 (Main Rein, 1969(3):121)。每個人營生在卡路里的消耗上，有一「科學的」標準——其實這標準也不免是任選的 (Arbitrary)、循環的 (Circular)、相對的 (relative)，我們可以一步

一步來看：

首先，以花在食物的費用與總消費之比率 (Engel Coefficient) 來說，在同一的消費尺度中，食費比率愈高者，表示其愈接近維生的水準，亦屬貧窮的行列。在美國，一般的水準是 0.10—0.15，至於 0.25 以上的就屬低階層的人士了！

不過，營養的需求，因着年齡、性別及工作性質 (甚至文化) 而不同，青壯年所需之卡路里自然要比小孩及老年人為多，男士多半比女士需要多量的卡路里；體力工作者比勞心者在卡路里的消耗亦顯然不同。因此，營養需求水準的訂定，要考慮其本身的變異性質。還有另一種變異發生在行為與態度上的差異：專家用以計算消費的水準或一個人觀念裏的標準，往往與實際的行為層次有一段差距，以致影響標準比率之誤差範圍。因此，這一比率數也應審慎地使用。

總之「貧窮」是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社會現象，是一種社會變遷時適應不良的一面，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某時某地的人羣，由於其收入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因而影響到體力、精神、情緒、社會秩序、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等「一種生活狀況」(王維林，一九六九·五九)。從不同的角度和論點，對「貧窮」可以有不同的測定方法；着眼於資源分布的不平等，生活方式的不同 (Townsend P. 1974:36)；收入水準與消費方式 (王典謨，一九七二) 等，依不同的測量着眼點而有不同的分類：如 Miller 以家庭關係的穩定與否、家庭收入的足夠與否將貧窮家庭劃分為四；Charles Booth 將東倫敦人民之生活及工作依次分為八級 (唐于蘭，一九七八·一一、一七)；Williamson et al 用收入、福利地位及社會經濟地位做成十六項測量指標 (Williamson et al. 1975:652)。值得注意的是：用不同的測量方法或分類標準時，對其結果的比較要特別小心，因為不同的指標間，可能會有紛歧的結果出現。社會機構為了處理貧窮所產生的問題，煞費周章地劃定貧窮線以為依據標準，而這依據標準的考慮是否恰當與周詳，是否能切合實際情況，對貧窮問題的解決有很密切的關聯，各種角度的觀察和研究，都將能對問題的真相提供更進一步的分析與了解。

### 叁、貧窮文化

貧窮的概念由最簡單的「最低生活水準」——絕對標準，進而發展到包含較多因素的相對標準；由單純的「貧窮線」修正到「貧窮帶」的概念；更由於重視社會結構與工業化經濟所導致的貧窮，而發展出危機貧窮 (Crisis Poverty) 和結構貧窮 (Structural Poverty) 的概念，前者討論經濟發生危機時的社會狀況，後者討論經濟正常發展、組織結構健全的社會。(詹火生，一九七五：九一) 危機貧窮事出有「因」，問題比較單純，往往只是實質的問題，而結構貧窮則是整個社會文化體系的問題，並非一小串治標的方案可解決。人類學家 Oscar Lewis 以其自一九五九年起的一連串研究中——包括墨西哥城及波多黎各的貧民窟等地的調查研究，發現這種結構式的貧窮而創用了「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 一語。

在 Lewis 的個案研究中，他發現窮人的生活狀況、行為模式及宇宙觀等，有着相當程度的共同點，而這些共同點足以由大社會所持有者分別出來，並且由上一代傳給下一代，讓下一代難以逃避貧窮的厄運，造成惡性循環。他列舉了數十項特質來描述貧窮文化。

在貧窮文化與大社會文化的關係上，「貧窮文化的分子對政黨、工會、教育機構等的參與率甚低，不信任政府、警察、教會及統治階級；而社會機構中，他們參與較多的却是監牢、軍隊或是社會福利機構。(沙學漢，一九七四：四一)

在經濟方面，貧窮文化表現了長期的為生存掙扎、失業或未充分就業，低工資、非技術性職業，童工，沒有儲蓄，家庭週期性的缺錢和缺乏存糧，每次需要的時候才一次次地去買吃的，上當舖當東西，向地方錢莊借錢，穿二手的衣服、用二手貨等。

在家庭方面，同居方式往往取代正式結婚，高比率的遺棄妻兒，家庭中傾向以母親為中心和母方親戚較接近，小孩子享受「受到保護及照顧的兒童期」為時甚短，大多很早就開始分擔家事、外出工作，性生活開始較早，常常為家中有限物質而爭執，口頭上雖然強調家庭分子應團結一致，事實上，家庭分

子不和的情況常見，家庭中往往有一權威人物以解決紛爭。

此外，居住擁擠、缺乏隱私、愛看熱鬧、酗酒、用武力解決爭端，除家庭外，甚少有其他社會組織，社會結構鬆散等是表現在社區方面的特質。脆弱的自我結構；對性別認同迷惘；缺乏控制衝動的能力，懷着過一天算一天的「只顧目前」人生觀，不太計劃將來，容易認命和忍從；有濃厚的男性優越感，對各種心理病態却視若無睹，相安無事；有狹窄的地方性，只知他們有自己的小社區，只顧自己的問題，不重傳統，也甚少緬懷過去，這些都是在個人方面貧窮文化所表現的特質。（沙學漢，一九七四；丘延亮一九七六）

雖然，以上分別了幾類貧窮文化的特質，但各類特質之間實有着高度的相關聯，任何單獨的特質，並不足構成貧窮文化，在社會的其他階層也可能具有其中的個別特質，必須上述各特質集攏起來，才構成貧窮文化。至於各特質的比重，則可能因文化、地區及時間而有所差異。

根據 Lewis 的觀點，「貧窮現象」和「貧窮文化」是有區別的，有些社會具有貧窮問題，却未產生貧窮文化，如許多原始、前文民族（*preliterate peoples*）、印度的 *Chamar* 階級、東歐的猶太民族、古巴等地（鄭美能，一九七四：四一五），這些地方雖然生活窮困，却是大家一致，不似在變遷過程中被洪流冲刷下來或未及接受變遷而形成的特殊貧窮，後者的特色是「感到社會的一切設施都不是為他們而設，他們感到不能歸屬，有見外、無根、不經心、甚至玩世不恭、嫉恨、仇世的態度。」（李亦園，一九七五：二二八）而這些現象又容易產生在六種社會情況之中：①屬現金經濟（*Cash economy*），工資勞動和為利潤而生產；②失業及不充分就業率高而持久；③工資低；④無論政府或志願團體對低收入的人口，沒有提供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組織；⑤屬雙系親屬體系之社會，而非單系者；⑥統治階層之價值觀強調財富與資產之累積，節儉與上升社會流動之可能，並視經濟地位低微乃個人能力不足所致。

Lewis 由其有限的研究所得資料，試圖建立「貧窮文化」的模式，對貧窮問題的探究具有相當的價值，但亦有某些論點不够清楚而受到嚴厲的批評。Anthony Leeds, Charlie Valentine 等人即對貧窮文化的理論建立及逐條特色加以詳細地批評列舉，謂其所列舉的特質欠精密而含糊，同時論點前後矛盾

，甚至誤用「文化」一詞（沙學漢，一九七四）。筆者以為，Lewis 在建立「貧窮文化」的模式過程中，固然態度不够嚴謹，所持的主張也似有矛盾，但說其根本誤用「文化」一詞則嫌過分。誠如 Alan Haber 指出的：文化代表着一羣人行為的一套規範和價值，而這一套系統是任選的（*Arbitrary*），並不是由任何人或團體強迫他們接受的，這一套系統並且是世代相傳的（Alan Haber, 1969: 395）。這正與 Lewis 所列貧窮文化的特質相符合。同時 Lewis 指出：並不是貧窮本身難對付，而是「貧窮文化」難對付，這才是貧窮真正問題癥結：窮人們的各種態度和價值體系，必須和其物質生活條件一塊兒改變，否則，貧窮問題仍將循環發生。

## 肆、貧窮的歸因與解決的方法

貧窮問題的歸因從其存在的歷史和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理出一個觀點，那就是貧窮問題是社會變遷中的失調現象。此一不協調的發生，學者以為來自三方面：

(1) 個人的無能。個人無法跟上社會的最起碼水準，可能是因為根本上能力的不足，或是受到環境的壓力，而無能力應付社會的變遷。但這個人的因素追根究底，只佔了非常小的比例，甚至從現代社會福利觀點根本視貧窮與人無關，應由社會負其責任。

(2) 不利的物質環境。如自然資源稀少、氣候惡劣、瘟疫等，足以造成社會經濟的失調，使社會生活失去原有的秩序，發生混亂的局面，原本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就更無法跟上腳步了。

(3) 社會結構的問題。如經濟制度未發揮完整功能，產生財富分配不均，商業蕭條及廣泛失業等。

後二因素才是社會學者較為重視的地方，尤其是社會結構的問題，今日的社會貧窮，主要歸咎於經濟制度未能公平地分配財富，才產生了貧富之差別，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工業結構下，貧窮問題永遠與之俱存（Meissner Hannah, 1973），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存在一天，「貧窮」就會存在不得消滅，因為社會上永遠有貧富之差，只是程度上的大小而已；而由結構的觀念所引

申出來的「貧窮文化」，則經由改變其文化或次文化體系，是可以將之消除的。但貧窮文化的消除，並不表示「貧窮」之不存在！

Oscar Lewis 提示的觀念——從「貧窮文化」的體系下手，改變其價值和規範體系，使這種「文化」或「次文化」不再構成大社會體系中的問題，貧窮問題才得解決。如在美國，社會工作者在試圖提高貧窮家庭的生活水準時，將重重地倚賴精神醫學的工作，即是這種觀念的具體表現；低度開發國家，治標的社會工作，並不能解決社會貧窮問題，必須設法達到公平地分配增長中的國家財富，使工業化過程中，人們所付出的犧牲更平等，社會才能期待獲得安定。

至於具體的對付貧窮的辦法，一般總是從兩方面着眼：結構性對策（治本的長期對策）及病理性對策（治標的短期方案）。前者如改變社會組織結構，使組織發揮力量，增加成員的個人能力；由政府擔任最後的雇主，大量舉辦公共工程，提供就業機會；創造新型職業，增強個人謀生能力等措施。根本在圖改變現存的社會結構，使之趨向於分配機會的均等。後者如提供各項社會服務，加強福利救助，幫助貧民解決困難，增加貧民收益等措施，旨在解決現時發生的貧窮問題，直接提升貧民的生活水準，爭取一時的效果，解決眼前的問題。不過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此二類對付貧窮之法應配合使用才能克竟全功，否則縱使「貧戶」完全消滅，貧窮問題仍然存在。

## 伍、台灣貧窮問題的研究

政府遷臺以來，對貧戶的調查工作雖然很早即已開始，但範圍僅限於對貧戶的一般例行調查，未能對貧窮問題深入分析，直到近五、六年來，才散見數篇整理分析，對臺灣地區的貧窮問題做本質上的探討。

基本上，臺灣並不存在「貧窮文化」（也許應說中國社會不存在有貧窮文化），因為此地是個組織嚴密的社會，有各種血緣、地緣的組織及經濟、社會、職業、宗教的團體，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很強。南島社區雖有一些貧窮的特質，但絕非「貧窮文化」，社會上提供他們流動的機會並不比一般少，社區居民並不存在有不能歸屬的感覺（林美蓉，一九七七）。

臺灣的貧民和美國的比較，有五項主要的不同：

- (1) 不存在有種族歧視。
- (2) 上升的社會流動大。
- (3) 擁有精神生活的傳統文化（寬恕、容忍等），不致破壞性行為或放縱性行為。
- (4) 具倫理的精神，對婚姻的背叛或遺棄相對較少。
- (5) 尚未形成高度資本主義，能顧及貧民的生活（廖榮利，一九七五）。

這主要的不同，支撐着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也呈現出臺灣貧窮問題的特色——結構上的問題並不嚴重，但這並不表示可以疏忽貧窮的問題，事實上，在臺灣我們對於貧民基本人權的自尊和自重及對貧民的服務精神，甚至對貧民的了解都還未能完全地建立，更惶論解決貧民的問題。

在臺灣地區貧戶致貧的原因分析中（陸光，一九七五），佔第一位的是「原來貧窮」，顯示惡性循環的特色，第二位的「人口衆多」及第三、四位的「久病不癒」、「殘障」，則顯示的是物質條件的惡劣，今年年初公布的「社會救助法」當能補救一些。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臺灣目前所能做的，也暫以治標性的辦法為主，其成效則仍有待觀察！

以簡單而又稀少的研究，實不足以窺臺灣貧窮問題的一斑，社會學在此一領域的研究不消說是迫切地有待加強。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 王維林 一九六九 貧窮的性質(兼談美國向貧窮作戰) 社會建設季刊 No:2 (56-64)
- 王典謨譯一九七一(R費嘉生作) 美國的就業情形及「與貧窮作戰」運動·社會建設季刊 No:9(41-48)
- 丘延亮譯(Oscar Lewis) 貧窮文化(譯者話) PP.1-8(臺北水牛) 一九七六
- 朱崙樓譯一九七二(柯尼格著) 社會學——社會科學導論(臺北協志) (9th ed) PP. 308-311
- 李亦園 一九七五人類學與現代社會(文化變遷與現代生活) (臺北牧童) PP. 123-134
- 李長貴 一九七三論貧窮與消除貧窮對策, 社會建設季刊 No:13 (38-48)
- 沙學漢 一九七四貧窮文化——一個評論, 臺大社會學刊 No:10 PP.41-50.
- 林美蓉 南島——一個都市平價住宅區的社區研究一九七七, 臺大考古系碩士論文
- 唐于蘭 一九七八臺北市平宅社區; 非平宅社區青少年特質和生活比較研究第二章 貧窮的社會學研究, 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陸光 一九七五臺灣地區的貧窮問題, 社會建設季刊 No:22 PP. 32-55
- 詹火生 一九七五論英國社會福利政策若干問題, 社會建設季刊 No:25 PP. 89-96
- 廖榮利 一九七五貧民和專業人員對貧窮和服務貧民的看法, 臺大社會學刊 No:11 PP. 94-114]
- 鄭美能 一九七四貧窮問題之探究, 思與言 12(3):1-6

### 二、英文部分

- Eames Edwin & J.G. Goode
- 1973 Urban Poverty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 (New York: Free Press)
- Ferman Louis A., Jocke L. Kornbluh; Alan Haber (ed.) 1969 Poverty in America
- (1) Introduction (Michael Harrington) PP. vii-xviii
- (2) Our Invisible Poor (Dwight Macdonald) PP.7-24
- (3)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Poverty (Martin Rein) PP.116-129
- (4) The People left behind: The Rural Poor (Martin Rein) pp. 152-159
- (5) Focal Concerns of Lower-class Culture (Walter B. Miller) PP. 396-405
- (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Oscar Lewis) PP. 405-415
- Townsend P.
- 1974 Poverty as a relative deprivation: resources and style of living (in "Poverty Inequality & class structure" Wedderburn D (ed.)) Cambridge univ Press PP. 15-41
- Williamson J.B & Kathryn M.H.
- 1975 Th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Poverty in Social Problems Vol12(5):652-656